

中國大陸私立大學組織 特徵的環境因素分析

閻鳳橋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經濟與管理系副教授)

摘要

私立高等教育在中國大陸中斷了三十多年之後，於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初得到了重建與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它從整體上表現出了國外私立大學所不具備的一些組織特徵。本文從組織理論研究角度出發，分析大陸私立大學組織特徵及其形成原因，指出由於環境的變化與高等學校之間的競爭，以及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大陸私立大學的發展，除了展現出組織通用結構特徵和成長與死亡的特性外，亦具明顯的地方特質。

關鍵詞：中國大陸、私立大學、組織特徵、環境因素

* * *

一、引言

一九五〇年代初，由於國家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變化，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私學在被政府取締、接管或改造之後，銷聲匿跡，並從五〇年代中期開始，大陸高等教育系統逐步變成了純粹的公立性質。同時，計劃經濟體制被複製到教育系統中，幾乎所有的教育活動都是通過政府計畫手段進行的，教育經費全部來自政府財政預算，政府部門通過計畫方式確定教育規模、教學計畫和教科書等，學生畢業後的就業也全部由政府統一安排。在這種體制下，學校的辦學水平和相對地位等級是基本固定的，學校之間缺少競爭，如果說學校並非完全靜止的話，那麼微小的變化也是自上而下進行的。

從一九七〇年代末開始，中國大陸實行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放棄了實行三十多年成效有限的集中計劃經濟模式，逐步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體制、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在這個過程中，原有的各種組織類型（包括企業、政府機構、科研機構、醫院、學校等）逐步轉型，在所有制結構、產權結構、治理結構、激勵機制等方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研究這些組織形式的特徵和演化路徑，不僅具有現實意義，而且也具有理論價值。在有關組織問題的研究中，環境對組織的影響和作

用機制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課題^①，而中國社會轉型為研究環境與組織作用機制提供了現實場景。

一九八〇年代以後，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私立大學的設置獲得國家憲法的認可，並且得到快速發展。在其興起與發展過程中，亦展現出處於動態環境變化中組織的若干特性，從大學的社會聲譽、公眾信任度、辦學規模到組織結構和質量，無不打上社會變革的烙印。

關於私立大學的組織特徵，國外一些學者將之歸納為「專門性」（specialized）或「非綜合性」（non comprehensive），表現在辦學使命獨特、辦學形式受社會控制程度較小、具有較大的自主性和選擇性等方面。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在於，私立大學在沒有直接獲得公共教育經費和主要依靠社會捐助以及收取學費辦學的情況下，卻得與獲得較多公共資源的公立大學進行競爭，要在公立高等教育系統的『夾縫』（niche）中找尋自己生存的空間，於是在招生物件上出現針對性強的現象，例如對於教育內容和形式有某種偏好、家庭處於某個特定的經濟收入階層或有某種宗教信仰等特徵的學生群體，與此同時，其專業設置亦集中在旅遊、文秘、外語、工商管理、會計等辦學成本低、市場需求量大、對固定資產投入需求較低的領域。以美國為例，私立大學主要集中在某些辦學類型上，如研究型大學、精英型的文理學院、具有宗教性質的學院以及一些側重職業培訓的教育機構^②。

中國大陸私立大學^③的辦學情況在有些方面與上述概括有共同之處，比如說專業設置的應用性較強、成本較低等，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卻存在著差異，具有很多其他國家私立大學不具備的特徵，如辦學主體多元化^④、公私立大學界線不甚清晰^⑤、營利性行為^⑥、家族式管理^⑦、注重擴大辦學規模^⑧、學校教學層次多樣^⑨、地域性特點明

註① 斯格特著，《組織理論》，第4版（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年），頁115。

註② Daniel C. Levy，「私立高等教育的角色：與中國發展現實相關的國際趨勢」，在北京大學和廈門大學的演講稿，2000年5月11、14日，國際高等教育研究（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所），第2期（2002年），頁1~8；Roger L. Geiger, *Private Sectors in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 Function, and Change in Eight Countr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6), pp. 161~198.

註③ 在大陸一般採用「民辦大學」和「民辦高等教育」，較少採用「私立大學」和「私立高等教育」。為了便於與國外的私立教育相對照，本文中主要採用後一種稱謂。

註④ 中國大陸非公有辦學體制有以下幾種形式：個人辦學、社會團體辦學、公辦民助、民辦公助、中外合作辦學等。

註⑤ 這種情況在轉制學校（公辦民助）和混合制學校（民辦二級學院或獨立學院）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註⑥ 在《民辦教育促進法》起草過程中，關於舉辦者能否獲得經濟回報是爭論最大的一個問題。在中國大陸，捐資辦學（donation）的情況所占的比例不到10%，多數學校是投資辦學（investment），投資者或辦學者期望能夠從辦學中獲得經濟回報，所以私立大學雖然從名義上屬於非營利機構，但是實際營利行為是難以避免的。

註⑦ 如同企業家族式管理方式一樣，家庭成員佔據著學校的重要管理崗位。

註⑧ 對於私立學校來說，有學生就有經費，學校就可以生存和發展下去，所以私立大學比較重視追求辦學規模，而相對忽視辦學質量。

註⑨ 多數私立大學的教學內容是多樣的，包括各個層次、各種形式，專門化程度較低。

顯^⑩等。這些特點都與中國大陸私立大學所處的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表一中，筆者對中國大陸私立大學與美國私立大學的一些特徵進行了比較^⑪。在美國法律制度上，對於私立非營利大學與營利性大學進行了嚴格的區分，前者享受多種稅收優惠，與此同時必須遵守辦學節餘經費全部用於辦學、不進行分配的規範，後者的經營與企業相似，不享受稅收優惠，可以利用市場進行融資，參與辦學經費節餘的分配。在表一的比較中主要指非營利私立大學。學校董事會扮演學校託管者的角色（fiduciary duty），它代表學校的整體利益，保證學校履行建立之初提出的辦學使命；學校的經費來源有多個渠道，除學費外，社會捐贈和政府劃撥的研究經費也佔有一定的比例；學校具有較大的辦學自主權，接受來自社會仲介組織的認證。中國大陸私立大學與美國私立大學的最大不同之處是其經濟特性和組織特性兩個方面。雖然中國法律規定私立大學屬於非營利性組織，但是私立大學的實際行為卻多有營利性的特徵，私立大學的辦學經費主要是學生繳納的學費，政府在學校設置、專業設置和學校升格等方面控制著私立大學的發展，董事會要麼不發揮實質性的作用，要麼帶有特定的利益傾向。

表一 中美兩國私立大學比較

比較項目	中國大陸	美國
辦學性質	「非」營利	非營利
舉辦者	個人，企業，社會團體等	法人團體
數量	與公立學校數量相當，學生占全部學生的 10 %左右	與公立學校數量相當，學生占全部學生的 20 %左右
質量	總體低於公立大學質量	在高水準大學中佔有相當的比例，一部分優秀的私立文理學院
最終經費來源	學費	學費、社會捐贈、政府對教師提供的研究經費和政府向私立大學購買教育服務而提供的經費
教師	兼職為主	專職為主
外部評價與控制	政府，代表創辦者和投資者利益的董事會	社會認可度較高的仲介認證機構，代表社會和團體利益的董事會

註^⑩ 不同省份的私立高等教育表現出不同的特點，有所謂的「陝西民辦高等教育現象」、「浙江民辦高等教育現象」、「廣東民辦高等教育現象」等。

註^⑪ 閻鳳橋，「美國私立高等教育特徵分析」，黃河科技大學學報（鄭州），第 3 期（2003 年），頁 143~152；William Zumeta, "State Policy and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John Smart ed., *Higher Educati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NY: Agathon Press, 1997), vol. 12, pp. 43~106.

對於以上中國大陸私立大學發展的特質，已經有不少研究文獻論及了上述現象，但多是從規範角度（normative paradigm）出發，把它們作為存在的問題提了出來，試圖找出解決問題的措施或途徑，而較少從分析角度出發，系統地分析出現這種現象的社會原因是什麼。本文擬採用分析範式（analytic paradigm），從制度環境和技術環境的角度，對於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進行一些探索性的分析。本論文之分析主要從種群生態理論（population ecology）的基本原理出發，然後結合大陸相關之研究文獻、田野調查之所得，以及回歸分析之結果，分析中國私立大學的特徵以及它們形成的外部環境因素。在田野調查部分，筆者獲得世界銀行資助，參與完成了「中國民辦教育發展研究」的課題，於二〇〇二年三月至二〇〇三年二月期間，在大陸14個省範圍內調研了59所私立學校，其中私立中小學36所，私立大學23所。在調研過程中，主要採取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方式，向政府部門的負責人、私立學校的管理者、教師和學生瞭解情況，並觀察教師和學生的課堂教學活動。

本論文主要分為五個部分。除第一部分引言外，第二部分進行了研究文獻的評述，分析了制度環境對組織群體發展與存亡之影響；第三部分回顧了一九八〇年代至今大陸私立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歷史；在本文第四部分，作者結合文獻和田野調查之所得分析大陸私立大學組織發展之特徵；在第五部分，以各省私立高等教育規模的相對比例為因變項，以人均GDP、文盲率、教育經費和社會團體和個人辦學經費等為自變項，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只有人均GDP與各地高等教育規模之關係呈顯著之結果，反映了現階段大陸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的經濟導向性特點。

二、組織群體的發展與存亡

任何組織都處於一定的環境之中，與環境之間發生著各種各樣的交換和互動，環境特徵影響著組織的特徵，環境的變化會導致組織的變化。在組織進化過程中，組織種群的形態受到環境的影響，並且趨向與環境保持同型^⑫。如果環境是同質的（homogeneous），則組織也會趨向於同質；如果環境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則組織也趨向於多樣。這是從一般組織研究中得出的基本結論。組織所處的環境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技術環境，指組織的投入、產出及競爭者的本質和來源；另外一類是制度環境，指認知的、規範的和管理的結構與行為^⑬。這兩種環境形式都會對組織結構產生一定的影響。在上世紀六〇年代，美國學者Lawrence和Lorsch的研究發現，有效組織在面對快速變化的技術環境時會選擇非規則協調機制，在面對穩定的技術環境時則採用規則協調方式^⑭。還有一些研究表明，如果環境變化不定，組織結構易於趨向

^{註⑫} Glenn R. Carroll, *Ecological Models of Organizations* (Massachusetts: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pp. 3~6.

^{註⑬} 斯格特著，*組織理論*，第4版（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年），頁122~124。

^{註⑭} Paul Lawrence and Jay Lorsch,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Managing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3~10.

「通用性」(generalist)，以其靈活的特質滿足環境快速變化的需求。反之，如果在穩定和確定性強的環境下，組織結構傾向於「專門化」(specialized)，以其程式化的工作流程和高效率的特質，適應穩定環境的需求^⑯。對於制度環境對組織特徵的影響，DiMaggio 和 Powell 的研究指出，一個組織對於某些組織的依賴程度越大，該組織的結構和行為就越相似於它所依賴物件的結構和行為^⑰。

在適應環境變化的同時，組織還承受著內部慣性的反作用，這種作用和反作用構成了組織進化的基本機制^⑱，之所以存在著環境對組織的自然選擇，就是因為同時存在著組織適應外部環境變化和組織保持慣性兩種力量。在進化過程中，組織面臨著競爭與制度環境的壓力。在自然選擇力作用之下，競爭和制度壓力可以使一些適應性較差的組織死亡；相反，適應性較強的組織不僅能夠保存，而且可以得到發展。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組織群體，所面對的制度環境和競爭壓力是不同的。在組織群體剛剛誕生之時，組織群體往往面對著較大的制度約束，社會認可程度低，要為獲得認受性 (legitimacy) 而付出成本，甚至由於組織功能與社會制度不符而被淘汰，但是由於發展初期組織群體內個體的數量較少，組織群體內部競爭程度較低，所以競爭對於組織的生存不構成威脅。隨著組織群體逐步得到社會制度的接納和認可之後^⑲，組織就會進入一個比較自由的競爭階段，組織群體內個體的數量會增加，競爭因素的作用上升，在競爭過程中，有些組織因為不能獲得足夠的資源而無法為繼。

組織群體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影響它生存的環境因素也不同。概括起來講，組織的死亡率取決於兩個因素，一個是認受性，另外一個是競爭。當環境中某種組織形式的數量增加時，這種組織形式的認受性得到提高，與此同時，由於組織數量增加，所以組織間的競爭程度也在提高。一般而言，組織的「死亡率—時間變化曲線」是一個 U 形曲線，即在組織種群創建之初，由於認受性因素作用，組織死亡率較高，而後隨著認受性程度的提高，死亡率降低，即至第三階段，因組織種群越來越大，組織之間的競爭程度的提高，所以組織死亡率再次提高^⑳。種群生態理論認為，認受性機制與競爭機制不是截然區分的非此即彼的關係，而是此消彼長的關係。我們可以根據大陸私立大學組織群體的發展變化來驗證這一理論的適用性。

註^⑯ Michael T. Hannan and John Freeman,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82 (1977), pp. 929~964.

註^⑰ Paul J. DiMaggio and Walter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63~82.

註^⑱ Michael Hannan and John Freeman, *Organizational Ec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3.

註^⑲ 認受性發展規律在其他國家私立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被同樣證實。多數國家私立高等教育經歷了一條從政府不承認，到政府承認但予以控制，再到政府提供經費補助等幾個階段。

註^⑳ Jeffrey Pfeffer, *New Directions for Organization Theor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66.

三、大陸私立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①

誠如種群生態理論所指出，一個新興組織種群的出現是由於環境變化引起的^②。私立高等教育在大陸的再生過程，同樣是在制度變遷過程中進行的，沒有社會制度的變化，就不會有私立教育系統的重建。從八〇年代初到今天，私立大學在大陸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過程，這不僅是私立教育制度重建和私立教育認受性提高的過程，同時也是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以及私立大學與私立大學之間競爭程度提高的過程^③。

從上世紀七〇年代末開始，中國大陸組織存在的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而也影響到了組織的形態特徵。七〇年代末，「左」的思想路線受到否定，國家發展的重心從政治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領域，對個人的需求給予更多的肯定和滿足，在政策上對各種非公有成分給予相對寬鬆的發展環境。於是有一批熱心教育事業的人，在較為簡陋的條件下舉辦起各種非政府性質的學校或培訓機構，以滿足人們接受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一九八一年，《高等教育自學考試試行辦法》公佈，鼓勵未接受正規大學教育者通過自學考試方式獲得學歷證書，於是在一些中心城市開始出現了輔助這種制度運行的私立教育組織，以滿足自學者參加考試的需求。一九八二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首次確認了私立教育的合法地位。在這個時期，像北京自修大學、長沙韭菜園大學、長沙東風業餘大學、曙東財經專科學校、北京中華社會大學、九巍山學院、中國邏輯與語言函授大學、廣東業餘大學等一批私立大學相繼建立^④。

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頒佈，強調辦學體制的多樣化，私立教育系統得以進一步的發展。但於此同時，私立學校在辦學和管理過程中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部分學校辦學條件較差，教育質量不夠穩定，有的學校未經教育

註^① 感謝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生林小英提供的一些參考資料。

註^② Michael Hannan and John Freeman, *Organizational Ec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3; Glenn R. Carroll, *Ecological Models of Organizations* (Massachusetts: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p. 3.

註^③ 由於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舉辦的一些項目相同，所以它們之間的競爭對象主要是參加全國自學考試的學生和參加成人教育的學生，1999年國家實行高等教育擴大招生規模政策後，升入公立大學的機會增加，私立大學的生源受到了影響。私立大學與私立大學之間的競爭可以從每年秋季錄取新生大戰中略見一斑，獨立學院成立後，對於純粹民辦大學的生源產生了一定的衝擊。公立大學之間競爭的主要對象是優秀學生，如高考狀元和獲得國際奧林匹克競賽獎牌的學生，在每年的高考報名和錄取過程中，各個學校主動進行招生宣傳工作，通過為優秀學生提供獎學金和其他資助條件吸引學生。從學生方面看，高等教育規模擴大後，就業問題變得比較明顯，因此一些學生放棄去普通大學上學的機會，而願意參加來年考試，爭取到重點大學學習。一些機構進行的大學排行和國家的重點大學建設工程，促進了公立學校之間的競爭程度。

註^④ 楊全印，「關於我國二十年民辦教育政策的思考」，江西教育科研（南昌），第1~2期（2002年），頁55。

行政部門批准，擅自頒發證書，也有個別學校做虛假廣告，矇騙學生。一九八七年，當時的國家教委下發了《社會力量辦學的若干暫行規定》，針對民辦教育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要求各省市採取措施加以解決。隨後，國家教委又針對私立學校制定了財務管理、教學管理、印章管理、廣告審批等規定^㉔。到一九九一年底，私立高校和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發展到了 450 多所^㉕。

一九九三年，《中國教育發展與改革綱要》頒佈，對於私立教育的發展提出比以往更明確的政策方向，在「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加強管理」十六字方針^㉖的激勵之下，私立高校和私立高等教育機構躍增，一九九五年達到了 1,219 所，而其在校生人數於次年超過 100 萬^㉗。一九九七年，國務院又頒布了《社會力量辦學條例》。隨後，陸續有 20 多個省、市、自治區頒佈了地方性的私立教育法規，初步建立了私立學校審批制度、辦學許可證制度、財務審計制度等。一九九九年，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積極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以各種形式辦學，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形成以政府辦學為主體、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共同發展的格局。」改變了以往關於私立教育在國家教育體系中只佔據輔助性地位的說法。二〇〇二年，全國人大通過了《民辦教育促進法》，提出私立教育舉辦者可以從辦學投資中獲得「合理回報」，以鼓勵社會對私立教育的投入。

目前，大陸私立高等教育系統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可以獨立頒發文憑的學校，有本科和專科兩種水平；第二個層次是文憑考試學校，學生要參加由國家考試機構、地方考試機構和所在學校組織的考試，考試通過者可以獲得畢業文憑；第三個層次是自學考試助學機構，學校幫助學生學習國家自學考試的內容，只有考試通過者才能獲得國家頒發的自學考試文憑，學校沒有單獨組織考試和頒發文憑的資格。上述三類學校屬於純私立高等學校和高等教育機構，九〇年代後期，在私立高等教育系統中又出現一個新的成員，即獨立學院（過去稱為民辦二級學院）。這些學院是藉由公立高等學校的資源、辦學力量和民辦機制結合而成，至二〇〇三年，全國已經有 300 多所獨立學院。由於其辦學層次為本科，又有公立學校的聲譽為後盾，對於純私立大學的生存和發展產生了一定的衝擊。

表二為一九九四～二〇〇二年私立高等教育的機構數和在校生規模。二〇〇二年，具有學歷教育資格的私立高校共有 133 所，在校生 31.98 萬人，其他如學歷文憑考試試點學校和自學考試助學機構 1,202 所，註冊學生 140.35 萬人。從表三可以看出，私立學校數和私立學校規模在整個高等教育系統（不包括成人高等學校）中所占的比重。獨立頒發文憑的高校數和在校生規模所占的比重，一九九六年分別為 0.69 % 和 0.21 %，二〇〇一年則分別增加到 4.45 % 和 1.19 %。

註㉔ 孫琬鍾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律法規全書》（北京：中國法律年鑑社，1998 年），頁 980～984。

註㉕ 教育部發展規劃司，《2002 年中國民辦教育綠皮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7。

註㉖ 此《綱要》是繼 1985 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後中國大陸教育改革過程中的又一個重要檔案，對於教育改革和發展進行了全面的規劃。

註㉗ 教育部發展規劃司，《2002 年中國民辦教育綠皮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8。

表二 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和規模

年份	私立高等教育	
	私立高等學校	私立高等教育機構
1994	880 所	
1995	1,319 所	
1996	21 所 14,000 人	1,109 所 1,083,800 人
1997	20 所 14,000 人	1,095 所 1,190,000 人
1998	--	
1999	37 所 46,000 人	1,240 所 144,200 人
2000	37 所 72,000 人	1,282 所 981,700 人
2001	89 所 151,100 人	1,202 所 1,130,400 人
2002	133 所 319,800 人	1,202 所 1,403,500 人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和科研電腦網，2002年12月20日，<http://www.edu.cn/20011105/3008194.shtml>；教育部

發展規劃司，2002年教育統計摘要（北京：國家教育部內部資料，未正式出版，2003年），頁53~56。

註：第一行為機構數、第二行為在校生規模。

表三 獨立頒發文憑私立高校及其規模在全國同級學校中所占的比重

單位：%

年份	學校	在校生規模
1996	0.69	0.21
1997	0.70	0.27
1998	0.86	0.36
1999	1.70	0.56
2000	2.37	0.75
2001	4.45	1.19
2002	--	2.11

註：根據中國教育統計年鑑計算。



四、中國大陸私立大學組織特徵分析

大陸私立大學的建立是從零開始的，因此在制度和技術方面均受已經存在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統的影響，表現為辦學模式、教學內容，以致行為規範等方面。當私立大學規模變得較大時，私立大學與公立大學之間的競爭就不可避免了，在競爭中，兩類組織互相借鑑和學習，縮小了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之間的差別。其次，私立高等教育系統是在市場經濟體系下建立起來的，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與市場機制相適應的組織結構也逐漸形成了，生成一些特有的單元和系統，如招生、畢業生就業管理機構；第三，私立大學吸引了一些具有特殊背景和偏好的成員（包括學生、教師和校長），他們的特徵會影響這個組織的行為特徵。從總體上看，私立大學學生來源多來自於在大學入學考試中名次靠後的學生和落榜生，其教師多為兼職，或屬於臨時編制，而其校長中則不乏不滿公立機構的體制約束而從公立大學轉到私立大學的人員，但是由於私立大學的存在與發展離不開大的社會環境，所以他們不得不去適應外部環境，包括他們過去所厭惡的方面，如參加政府部門組織的一些與學校發展關係不大的會議，為了能夠通過政府部門的檢查，不得不做一些表面文章，甚至採取請客送禮的辦法。

除了上述列舉的一些現象，根據田野調查的結果亦發現「微觀環境」（niche）特性對於私立大學組織特性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大陸私立大學的發展中，我們可看到下面幾個特徵：第一，由於環境變化的影響，造成組織採用通用性結構；第二，隨著私立大學認受性得到社會的肯定，競爭逐漸上升為影響私立大學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第三，私立大學所處的區域環境特點，影響著該地私立大學的組織特徵。

特徵一：在特定資源和環境作用下形成的私立大學，具有通用性結構，隨著環境的變化，私立大學逐步從通用性結構向專門性結構轉化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初才成立的私立大學是一種新的組織形式，是生長在強大的公立教育系統之外的產物，在獲得辦學資源方面，公立大學明顯處於優勢地位，可以獲得政府的財政撥款，而私立大學處於相對劣勢地位，既不能獲得財政撥款，也幾乎得不到什麼社會捐贈，所有絕大部分辦學經費都是來自學生繳納的學費。在這種情形下，私立大學只有利用公立大學無法滿足社會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客觀條件，以及公立教育體制受約束多和不靈活的缺陷，在夾縫中獲得生存和發展。由於資源匱乏，它們不可能像公立大學那樣有細緻的內部分工，建立專門性的教學和管理結構，制定細緻的工作程式和規章制度，以應對常規事物。在公立學校中由幾個機構履行的責任，在私立大學則集中到一個機構去完成，私立大學聘用較少的專職行政人員，利用通用性結構的靈活特質，適應外部環境變化的需要。在專業設置方面，根據市場的需要，快速調整專業設置，根據學校發展的需求改聘和新聘相應專業方向的教師。

私立大學通用性的結構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教學形式和內容多樣化，最大程度地獲得辦學資源。多數私立大學都舉辦

多個層次的教學和多種形式的教學和培訓內容，如私立本科大學同時招收本科生、專科生甚至參加非學歷教育教學項目的學生；在許多能夠獨立頒發文憑的私立大學中，仍然舉辦自學考試輔導班，招收參加全國自學考試的學生；一些私立大學在正規教育項目之外，還舉辦了各種短期培訓項目，如駕駛培訓、英語考試培訓以及其他各種技能性培訓。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湖南經濟研修學院，學生規模不足一千人，辦學層次卻包括：研究生進修班、大專自考班、大學預科班、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和各種培訓班五種類別^㉙。同樣，最早具有獨立頒發文憑資格的北京城市學院（原北京海灘走讀大學），在校生超過萬人，其中接受學歷教育的人數不到一半，另外一半學生參加全國自學考試^㉚。學校採取此一發展策略，可突破政府計畫招生名額的限制，為學校的發展爭取更多的學生和經費資源。

（二）採取橫向和縱向辦學結構，減少對環境的依賴程度。有些私立大學建立了橫向或縱向整合機制，從橫向看，組成集學歷教育、短期培訓和產業於一身的多元化辦學體制，從縱向看，涵蓋了從普通教育到高等教育多級教育內容。諸如浙江萬里教育集團、黑龍江東亞學團、北京彙佳教育集團、北京南洋教育集團採取了類似於企業的縱向協調結構，上一級（如大學）的教育為下一級的教育（高中）提供「銷路」，下一級的教育為上一級的教育提供「原材料」，即從教育集團幼稚園出來的孩子，可以在小學部學習，小學部畢業後可以升入中學部，最後升入大學部學習，減少了各個教育階段招生時的不確定性及其成本。

（三）在教師管理方面，以「市場合約」取代「組織合約」，從而減少用工的社會成本。私立大學的師資以公立學校的退休教師和兼職教師為主，有時也聘請一些公立大學的在學研究生擔任教學工作，通過課時費形式購買教師的勞動，學校較少承擔這些「臨時工教師」的社會福利和其他社會成本（如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也不需要支付教師培訓和發展費用，因此相對於聘用專職教師而言是一種成本低的方式。學校與教師之間是一種鬆散的「市場合約」關係，私立大學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辭退不需要的和不滿意的教師，新聘發展需要的教師，在這個過程中，不需要付出諸如就業安置、勞動補償等社會成本。

（四）教師與管理人員之間的分工不甚明確，強調人事工作效率。為了提高效率，私立大學員工之間的分工往往不甚分明，學校配備很少的專職行政人員，一些行政工作是由教師兼任的，有些行政人員從事多種不同性質的工作，如教學管理人員可能同時承擔人事管理工作，從事檔案工作的人員可能同時也承擔校刊編輯工作^㉛。

（五）與教師管理相反，在後勤管理方面，許多私立大學以「組織合約」取代「市場合約」，以實現經濟理性的目的。私立大學承擔了較多後勤管理的責任，如承

^㉙ 劉莉莉，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44。

^㉚ 劉莉莉，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研究，前引文，頁44。

^㉛ 斯密在《國富論》一書中提出，勞動分工可以促進效率的提高，最著名的是製造針的例子，在沒有分工的情況下，一個工人每天的生產量不會超過20枚針，但是在分工的情況下，生產量增加到了4,800枚。見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頁6。

擔學生的住宿、飲食、就業指導，為學生配備有專門的「班主任」或「輔導員」，負責學生的生活問題。這與目前公立大學後勤社會化改革的方向正好相反。這樣做不僅適應了生源市場的需要，如高的就業率能夠幫助學校吸引來更多的學生，良好的住宿和飲食條件也有利於吸引來自外地的學生，而且後勤服務本身也是獲得辦學資源的一個重要方面。一所學校的校長坦率地說，學校不能把可以賺錢的後勤服務讓給外部市場，學校後勤服務收入是學校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⑩。

(六) 有些私立大學沒有很多固定設備，「專用性資產」(asset specificity)也很少^⑪。通過考察大陸私立大學的專業設置和培訓專案情況，不難發現它們設置的專業具有通用性質，往往是辦學成本較低的財經、外語、企業管理、旅遊、電腦、財務管理等專業，很少有公立大學所不具備的專業類型或特殊的培訓專案，因此也不需要設置這些專業和培訓項目所需要的特殊儀器設備、圖書資料和教師，在有些時候必須使用一些儀器設備時，也通過向其他機構租用的方式進行。這都有利於降低學校的專用性投資成本，增強學校的靈活性，通過市場途徑實現資源配置。有些私立大學租用公立學校的教學場地和設備，租用閒置的軍隊營房和其他公共設施，以減少固定資產投資。

(七) 通過採用「家族式」的管理結構，解決學校建立之初辦學者對員工信任度低的問題。與建立在能力和考核基礎上的科層結構相比，建立在家庭血緣關係基礎上的管理結構具有正規化程度低的特點，這種結構有利於減少辦學者的控制和監督成本，在社會誠信度低和社會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尤其具有合理性。具體表現形式為，辦學者往往在學校的主要部門（如董事會、財務處）安排自己的親屬，一些創辦者計畫自己退休後把位置留給親屬來繼承。在處理學校事務過程中，校長或董事長的權力很大，權力形式多屬於魅力性的^⑫。

(八) 在「名」與「實」、「形式」與「實質」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距。私立大學為了迎合社會需求，重視組織內部制度層^⑬的建設，聘請社會名人擔任學校的名譽職務，如名譽校長、名譽董事長等，以贏得社會的認可，通過廣告和宣傳等手段提高學校的知名度，相比之下，對組織內部技術核心和管理機構的建設則重視不夠，在專業設置名稱上盡可能迎合社會需求的口味，但是由於辦學力量不足，往往難以做到名符其實。

註^⑩ 這位校長在與筆者座談時講這番話的。

註^⑪ Oliver E. Williamson, *Market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Y: Free Press, 1975), pp. 50~69. 根據交易成本理論，如果組織的專用資產投入越小，它就越傾向於通過市場化的方式與其他組織發生關係；反之，如果組織的專用資產投入越大，它就越傾向於在等級制度下將各種生產要素進行整合。

註^⑫ 根據韋伯的劃分，權力形式有三種，它們分別是魅力權力、傳統權力和認受權力。另見閻鳳橋，「民辦學校校長魅力權威及形成過程」，《教育研究雜誌》(臺北)，第3期(2003年)，頁16~29。

註^⑬ 從內到外，組織內部結構可以分為技術核心層、管理層和制度層，技術層的作用主要是完成核心使命，對於學校來說，就是教學工作；管理層的作用是協調內部關係，整合內部活動，對於學校來說，職能部門起到管理協調的作用；制度層的作用主要是爭取辦學資源，包括解決組織認受性問題。

雖然大陸私立大學具有上述通用性和非正式組織的若干特徵，但是隨著組織建立時間的推移，私立大學的結構開始越來越多地包容了社會的制度性要求，逐漸從通用結構向專門結構轉變，對於內部管理機構分層提出了較高的要求。特別是當外部環境變得較為穩定、認受性地位得到法律和行政條例的認可和保護後，學校對於未來發展的預期也比較確定，於是開始加強組織的固定投入和基本建設，如逐漸提高專職教師的比例，把現職教師的進修和提高提高到學校發展規劃中，制定自己的規章制度^⑤。例如，西安東方亞太學院（獨立學院）院長表示，該校正考慮如何構建一支具有靈活性和穩定性的教師隊伍^⑥；一些私立大學亦正在考慮設計一種適合學校辦學目的和條件的新型「組織合約」，以實現上述靈活性和穩定性的目的。北京美國英語語言學院成立於九〇年代初，在發展過程中，該校逐步體會到規章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對於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學校來說，需要採取一個較為穩定的管理結構，這樣才能有效地協調各種關係^⑦。此外，一些九〇年代後由企業投資的學校，因有較強的資源投入和資金保證，於是設置了較多的專門管理部門，聘請較大比例的專職教師和管理人員，有較為固定的資產投入。

特徵二：在私立大學獲得認受性後，競爭因素的作用逐漸加強，使得私立大學之間在學生規模和資產等方面出現差距，一些私立大學在競爭中被淘汰

競爭是市場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只要維繫組織生存的資源是稀缺的，只要組織具有潛在的擴展可能，那麼競爭就會產生，而且競爭狀況會隨供需關係的變化而變化^⑧。北京培黎職業大學一位副校長對新聞媒體記者說，一九九八年之前是私立學校最好過的日子，高中畢業生逐年增多，而公立高校又沒有擴大招生規模，私立大學不必為招生發愁，開學報名時，學生自動找上了門。但是一九九九年大學擴大招生以後，高等教育市場逐漸從「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過渡，私立大學的生存環境發生了顯著的變化^⑨。因國家財政撥款無法滿足公立學校發展的需要，於是公立學校被迫面向市場，舉辦各種形式的非正規教育，如自學考試、成人教育等長期以來一直是私立大學生存所依賴的資源^⑩。私立大學競爭的對手包括公立大學舉辦的成人教育學院或繼續教育學院、獨立學院、網路大學、中外合作辦學和在中國境內招生的國外大

註^⑤ 如開始時，一些學校內部活動較少受社會制度的影響，但是隨著組織的發展，以自願或不自願的形式融合了社會制度要素，一些私立大學為了獲得認受性寧願以效率為代價，建立一些與技術核心活動關係不大甚至沒有關係的機構，如組建黨的組織。

註^⑥ 訪談資料。

註^⑦ 張莉娟，「我國民辦高校發展過程中的規章制度研究—北京美國英語語言學院案例分析」，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碩士論文（2003年），頁58~59。

註^⑧ 漢南等，「組織群體生態學」，竹立家、李登樣等編譯，《國外組織理論精選》（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頁190~205。

註^⑨ 北京：<http://www.prcedu.com>。

註^⑩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於2002年對40多所公立大學做了一個問卷調查，學校校長普遍反映，擴大規模有利於學校獲得辦學經費。

學。

在競爭過程中，各類學校的競爭地位是不相同的，在不同時期建立的學校具有不同的相對競爭優勢。例如，九〇年代後期由於企業的參與，出現了所謂「新生代」的私立高等學校，在辦學資金方面所具有的優勢，同樣反映到辦學條件和起點上。二〇〇三年，國家發佈了關於鼓勵獨立學院發展的規定，使得這類學院在文憑發放方面具有了一般私立大學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它們可以直接進入本科教育，對整個私立大學系統的生存和發展前景構成了一定的威脅。

競爭因素使學校的地位處於不穩定狀態，學校地位的波動較大。早期國家尚沒有制定出嚴格的設置標準，所以「三無」（無校舍、無資金、無師資），私立學校可以辦得起來，但是原國家教育委員會在一九九三年頒佈了《民辦高等學校設置暫行規定》，不符合條件的學校得不到政府部門的批准，在政府組織的學校評價中，一些學校因為不能滿足規定的辦學條件而無法獲得審批通過和升格。與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相伴隨的是相關規章制度的增加，現今的民辦學校不再能像以前一樣，完全靠市場獲得辦學資源，而不必承擔很多社會制度性成本（如教師的社會保險費），學校現在必須設置規定的機構和程式（如董事會、教職工代表大會、黨的機構），接受有關部門的評價和考核。

學校之間的競爭導致出現兩種結果。第一是優勝劣汰，有些私立學校由於生源不足，已經倒閉或名存實亡。據估計，目前約有三分之一的私立高校無法招到足夠的學生，學生減少或生源不足給學校的經濟運轉帶來了困難，導致出現學校倒閉的現象^①。一些私立大學的辦學者預計，這種現象將會越來越普遍。我們可以從下面這些資料中略見一斑。二〇〇〇年，民辦高校招生減少了 20 多萬人，約有 300 所學校處於生存危機狀態^②。出現私立教育機構停辦的情況，湖南有 35 所，廣東有 11 所，山西有 56 所，浙江倒閉的私立學校接近百所^③。

第二是學校間辦學差異性擴大，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目前學生規模最大的私立大學在校生規模在 3 萬人左右，而最小的學校只有不足百人。70 %以上學校的全日制在校生規模在 1,000 人以下，萬人以上私立大學約有 10 所^④。根據一些報導，在北京登記的 120 餘所私立高校裏，有實際招生能力的只有 35 所左右^⑤，規模分佈的大致情況是，在 2,000 人以下的占多數，5,000 人以上的有 9 所，萬人以上的有 3 所^⑥。

註^① 劉海波，「機遇與挑戰並存—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韓民博士談民辦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教育發展研究*（上海），第 4 期（2002 年），頁 38~41；「誰將成為第 100 個倒閉的學校—民辦學校倒閉現象掃描」，*光明日報*（北京），<http://www.gmdaily.com.cn/gmrb/gmrbhomepagensf/documentview/2001-07-09-05-52D1D032A0FA8E548.56A8400001E92?openDocument>。

註^② 張志義，「我國民辦教育在困境中」，*中國青年報*（北京），<http://www.edu.cn/20010823/208283.shtml>。

註^③ *中國經營報*（北京），2002 年 2 月 5 日。

註^④ 劉莉莉，*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24~25。

註^⑤ 北京，<http://www.prcedu.com>。

註^⑥ *中央電視臺網站*（北京），<http://www.cctv.com/news/other/20030904/100830.html>。

特徵三：私立高等教育的經濟特徵與區域性特徵

大陸私立大學多樣性的發展，亦佐證了前述種群生態理論所提出的環境多樣性是造成組織多樣性原因的說法^⑯。而今多樣性之發展可以從三個維度分析：

(一) 經濟發展水平：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和速度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既影響到私立高等教育的供給，也影響到對私立高等教育的需求。經濟發展水平不僅影響著私立高等教育的學生規模，而且還影響著私立高等教育的類型和質量。但是經濟發展水平並不直接作用於私立高等教育，而是通過公立高等教育的規模和水平、政策因素、人口因素等間接地影響著私立高等教育的發展。

(二) 地方私立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私立高等教育的管理權（包括學校設置和招生）主要在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改革分權化的趨勢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制定適合本地的教育政策和法規，從目前情況看，各地在制定私立教育政策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有些地方政府對於發展私立教育的態度比較積極，鼓勵性的政策和措施比較多，而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對私立教育持比較保守的態度，約束性政策較多，還有一些地方政府持自由放任的態度，允許私立教育自由發展。

(三) 私立學校所在地的人口和文化因素：如學齡人口、人們對於接受高等教育的期望、公立高等教育的發達程度。

雖然從理論上難以確定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機制，但是從實證角度看是可以發現一些規律的。大陸的私立高等教育不僅因地域性的差異具地方特色，而且因大陸區域發展的非均衡影響，私立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質量、模式有所不同，於是出現了所謂「浙江民辦教育現象」、「陝西民辦教育現象」、「廣東民辦教育現象」、「江西民辦教育現象」等^⑰。囿於篇幅，以下僅就陝西私立教育現象和浙江私立教育現象做一些簡單的分析。

(一) 陝西省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特質

陝西省西安市是私立大學分佈比較集中的地方，不僅學校數量多，而且在校生規模大，辦學形式以純民辦為主^⑱。二〇〇一年，陝西有獨立頒發文憑的私立大學5所，學歷文憑試點機構36個，自學考試助學機構63個。私立大學在校生規模達到14萬人，為當地公立大學規模的40%，占全國私立高等教育學生規模的14%^⑲。大陸私立大學在校生規模達萬人的僅有十幾所，陝西就有5所，占了將近一半。根據一位當

^⑯ Michael T. Hannan and John Freeman,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82 (1977), pp. 929~964.

^⑰ 柯佑祥，「新時期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高等教育研究》（武漢），第4期（2002年），頁32~34。

^⑲ 在最近與西安三所私立大學校長訪談時瞭解到，2003年5月教育部發佈鼓勵和支持發展獨立學院的資料後，對他們學校的發展影響很大，目前他們計畫與當地一些公立大學合作成立獨立學院，以獲得本科辦學資格。

^⑳ 梁克蔭，「『陝西現象』與民辦高等教育發展」，《高等教育研究》（武漢），第4期（2002年），頁38~40。

地受訪的辦學者分析，陝西私立高等教育的發達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陝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徵，有幾千年的文明歷史，因此文化和教育資源豐富，公立大學數量多，為私立大學創建時提供了必要的師資條件；二是地理位置特殊，交通較發達，吸引了週邊省份的學生前來學習；三是辦學成本低，建校費用、教師工資水平、學費、生活費水平較低，比較適合當前中國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四是私立高等教育的發展，擴大了私立大學學生在當地的消費（各種教育費用和與教育有關的生活消費），從而帶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很受當地重視經濟發展的當地政府的歡迎。目前，陝西省的私立高等教育已經成為繼兵馬俑後的第二大地方特色，並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政績，進而強化了地方政府支持私立高等教育意願。

為什麼陝西私立大學的發展具有許多相似性呢？對於組織研究得出的一些結論可以解釋這種現象，由於陝西省建立了較優越的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的生態環境，並且在一定機制（如學校間的相互交流、模仿、「裂變」）^{⑤1}作用下，其私立大學的發展規模和形式具有趨同性^{⑤2}。

二〇〇三年，由於獨立學院的快速發展，私立大學的生源受到影響，陝西省數所私立大學已開始與當地公立大學洽談合作舉辦獨立學院的事宜，並且這種發展模式具有向更大範圍擴大的勢頭。

（二）浙江省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特質

浙江省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的特點在於公立學校轉制和民辦獨立學院的興起與發展。依託名校資源，爭取當地政府支持，走市場化運作之路，這是浙江獨立學院發展的主要模式。截至二〇〇〇年底，浙江已經建立了18所獨立學院；二〇〇三年，在該省23所公立本科院校中，已有20所建立了獨立學院，有的學校擁有兩所以上的獨立學院。全省本科在校生有25.2萬人，其中獨立學院本科學生達8.64萬人，占總數的34.3%^{⑤3}。

獨立學院的蓬勃發展與浙江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多元化有著密切的關係。浙江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也相對比較高，在生活需求得到基本滿足後，人們對於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有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在無法進入公立大學學習的情況下，一部分學生不願意到辦學資格較低的純私立大學學習，而對於具有本科辦學資格的獨立學院情有獨鍾，願意多花一些錢接受這種教育。

獨立學院在浙江的發展與推廣，與政府的支持是分不開的。一九九九年七月，浙江大學和杭州市政府合作，聯合浙江省電信實業集團公司創辦了教育部批准建立的全國首家獨立學院—浙大城市學院。該校的建設用地由杭州市政府行政劃撥，徵地時需

註^{⑤1} 當地有幾所學校的舉辦者是從其他私立大學工作一段時間後，開始獨立辦學，在前一所學校取得的辦學經驗或影響後一所學校的辦學風格。

註^{⑤2} 根據 DiMaggio 和 Powell 提出的新制度理論，主要有三種機制促使組織同型，它們分別是模仿、壓服和專業規範。

註^{⑤3} 蔣萍、孫磊，「辦學規範管理嚴謹專業熱門。浙江民辦二級學院成『香餑餑』」，文匯報（上海），2003年8月19日，第3版。

要繳納的規稅、規費均獲得一定的減免，由市長親任工程建設領導小組組長，市政府於二〇〇二年進行增資擴股。與此同時，杭州市專門為學院組建了由28個委局組成的產、學、研合作委員會，向城市學院提供教學實習、實踐場所和畢業生就業機會^④。筆者最近到浙江省杭州市調研時，當地一位教育部門的負責人對我說，杭州市政府計畫在政策上給予優惠，吸引全國優秀的公立大學到杭州來進行合作辦學。

公立學校轉制是浙江省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的另一個特點。政府希望用民營機制來改造公立教育系統。萬里教育集團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它是在浙江機械工業寧波培訓中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資產歸國家所有，辦學所得上繳財政，由財政審核下撥辦學經費，集團有教師編制，享受與公立學校教師相同的待遇^⑤。

在私立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學校之間的模仿行為表現得很明顯。一旦某種類型的學校在一個地方成功地建立起來，便成為其他學校效仿的對象，因此私立大學的地區特徵除了辦學形式、學費、管理形式外，在專業含意方面亦現趨同性，例如西安幾所私立大學以外語教學為特色，河北的私立大學集中在醫學專業方面，江西的私立大學著重在服裝、電子、製造專業方面，與當地或週邊的經濟發展類型有密切的關係。

五、私立高等教育規模的相對比例與 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係

私立教育規模在教育系統中所占比例是私立教育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問題，各個國家私立教育規模在同級教育中所占比例存在著一定差異，這種差異引起了研究者的極大興趣。從研究文獻看，私立教育所占比例似乎是隨機的，沒有什麼規律，在發達國家中，既有私立教育所占比重較大的國家（如日本），也有所占比重較小的國家（如德國）；在發展中國家，既有私立教育所占比重較大的國家（如菲律賓），也有所占比重較小的國家（如斯里蘭卡）^⑥。

另外一些研究文獻資料表明，影響私立教育發展的因素包括：本國傳統、本國企業家創辦、教會學校、外國殖民政策和國外影響^⑦。中國大陸的私立高等教育發展則受到地方經濟發展水平深切的影響。本節利用一些統計資料，對這個命題進行實證研究。

據國家教育部公佈的教育統計資料^⑧，表五顯示中國大陸不同省份各級私立教育

註^④ 同前註。

註^⑤ 萬里教育集團，「探索一條教育經濟一體化道路」，《浙江民辦教育探索》（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5~38。

註^⑥ William K. Cummings, "Private Education in Eastern Asia," in William Cummings and Philip G. Altbach eds., *The Challenge of Eastern Asian Education*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 138.

註^⑦ William K. Cummings, "Private Education in Eastern Asia," p. 144.

註^⑧ 教育部發展規劃司，2002年教育統計摘要（內部資料）；《中國教育統計年鑑2001》（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2002年中國民辦教育綠皮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在同級教育中所占的比例、人均GDP、文盲率、公立高等教育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以及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辦學經費在總教育經費中所占的比例。從規模比例一欄可以看到，比例值從零到百分之七十幾不等（如圖一所示）。筆者採用多元回歸方法，對於上述資料進行一些統計分析，回歸方程中採用的變項的含意如下：

1、因變數（私立高等教育規模在同級教育中所占的比例，%）：根據二〇〇二年民辦高等教育規模的原始資料和高等教育規模（各省人口乘以每10萬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數）計算得到。

2、引數：

（1）人均GDP（元/人）：取自二〇〇一年《中國教育統計年鑑 2001》，顯示的資料為二〇〇〇年。

（2）文盲率（%）：取自二〇〇一年《中國教育統計年鑑 2001》，顯示的資料為二〇〇〇年。

（3）公立高等教育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元/人）：用二〇〇一年各省預算內高等教育經費除以高等教育人數得到。

（4）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辦學經費在總教育經費中所占的比例（%）：用二〇〇〇年各省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辦學經費除以總教育經費得到。

為瞭解以上之變數與私立大學發展之關係，我以規模為依變項，其他四個項目為獨立變項，並根據研究假設，建立以下回歸方程：

$$PP_i = a_{i1} + a_{i2}GDP + a_{i3}ILL + a_{i4}EF_i + a_{i5}PFP + \varepsilon_i$$

公式中：

PP_i ，私立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在同級教育規模中所占的百分比（%）

GDP，各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元/人）

ILL，各省文盲率（%）

EF_i ，私立高等教育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元/人）

PFP，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辦學經費在總教育經費中所占的比例（%）

a_{ij} ，私立高等教育第 j 個變數的回歸係數

ε_i ，私立高等教育回歸方程的隨機擾動項

利用 SPSS 統計軟體對資料進行運算，採取逐步回歸法（以消除引數之間的多重共線性），計算結果如表六所示。根據 F 檢驗值及其顯著性水平值對整個回歸方程做出判斷，因為 F 值的顯著性水平小於 0.01，所以整個方程通過了統計檢驗，說明依變項至少與一個獨立變項存在著因果關係。根據表六中回歸係數的 T 檢驗值及其顯著性水平值，判斷哪些變項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 0.05 的統計檢驗，並排除那些沒有通過統計檢驗的變項，最後只有描述經濟因素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進入了回歸方程，其他變項均沒有通過統計檢驗，被排除在回歸方程之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這個獨立變項解釋了依變項變差的 59.6%。人均 GDP 對私立高等教育規模在同級教育中所占的比例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的結果，影響程度為回歸係數值，說明人均 GDP 每增加 1.578E-03 元，私立高等教育規模的相對比例就增加 1%。

表五 各省私立高等教育規模在同級教育規模中所占的比例(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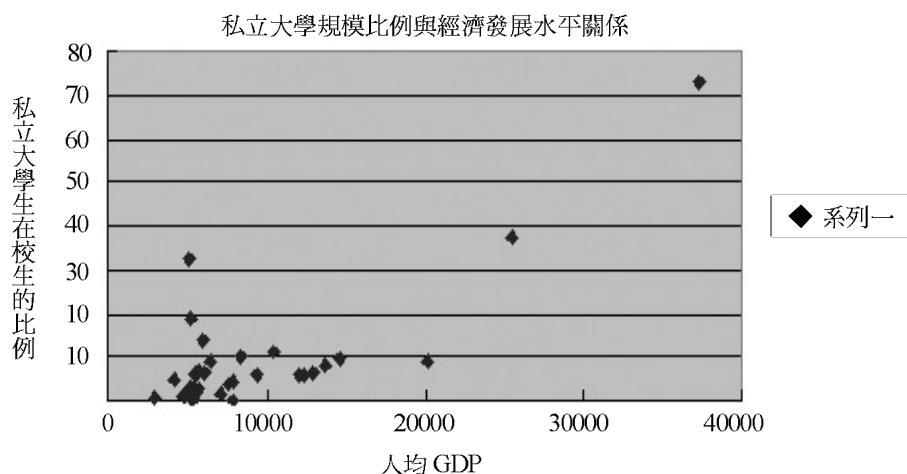
單位：%

省份	規模比例 (%)	人均GDP (元/人)	文盲率 (%)	生均預算內 教育經費 (元/人)	社會團體和公民個 人辦學經費在總教 育經費中所占的 比例 (%)
貴州	0.49	2,895.00	19.85	514.35	0.81
甘肅	4.69	4,163.00	19.68	748.01	0.34
廣西	0.86	4,668.00	5.30	658.30	1.46
陝西	32.71	5,024.00	9.82	774.39	2.54
江西	18.78	5,221.00	6.98	597.47	1.07
雲南	0.86	4,866.00	15.44	1,045.79	0.77
四川	2.65	5,250.00	9.87	711.29	1.03
寧夏	0.76	5,340.00	15.72	931.09	0.35
安徽	3.09	5,221.00	13.43	561.02	1.17
山西	5.95	5,460.00	5.68	744.11	2.51
西藏	0.00	5,307.00	47.25	1,751.97	0.00
青海	2.73	5,735.00	25.44	1,216.57	0.29
重慶	6.71	5,654.00	8.90	796.96	1.03
河南	13.84	5,924.00	7.91	533.21	1.81
湖南	6.51	6,054.00	5.99	727.65	1.87
內蒙	9.16	6,463.00	11.59	1,071.77	1.04
吉林	3.80	7,640.00	5.74	1,444.41	0.55
海南	1.39	7,135.00	9.72	853.32	3.19
湖北	4.30	7,813.00	9.31	814.84	0.44
新疆	0.00	7,913.00	7.72	1,317.39	1.54
河北	10.14	8,362.00	8.59	749.02	3.25
黑龍江	5.78	9,349.00	6.33	1,359.31	1.82
山東	11.08	10,465.00	10.75	1,017.02	2.07
遼寧	5.74	12,041.00	5.79	1,440.97	1.37
福建	6.08	12,362.00	9.68	1,181.37	2.89
江蘇	6.37	12,922.00	7.88	1,294.76	1.77
廣東	7.79	13,730.00	5.17	1,168.73	4.06
浙江	9.41	14,655.00	8.55	1,479.97	6.67
天津	9.16	20,154.00	6.47	2,255.37	5.55
北京	37.16	25,523.00	4.93	6,713.86	1.16
上海	72.98	37,382.00	6.21	5,615.14	2.66
參數	9.71 (14.5) [1.49]	9,377.00 (7,165.62) [0.76]	11.02 (8.31) [1.33]	1,357.72 (1,349.13) [0.99]	1.84 (1.51) [0.82]

資料來源：教育部發展規劃司，2002年教育統計摘要（內部資料）。

註：在最後一行資料中，平均值，（ ）為標準差，[]內為相對差異係數。

圖一 民辦高校規模比重分佈



表六 影響民辦高等教育規模所占比例的多元回歸分析

依變項： 私立高等 教育在校 生人數在 同級教育 中所占的 百分比 (%)	常數項	人均 GDP (元/人)	文盲率 (%)	生均財 政性教 育經費 (萬元/ 人)	社會團體 和個人辦 學經費在 總教育經 費中所占 的比例 (%)	調整後的 擬合優度 R-Square	F 值及其顯 著性水平
	-5.085	1.578E-03	-0.022	-0.062	-0.178	0.596	45.230
	-1.848	6.725	-0.175	-0.409	-1.413		(0.000)**
	(0.075)	(0.000)**	(0.862)	(0.686)	(0.169)		

註：從第2-5列，第一行為回歸係數，第二行為T值，第三行括弧中的數字為顯著性水平。第6列，第一行為F值，第二行括弧中的數字為顯著性水平。

**表示在0.01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統計檢驗。

六、結語

私立大學是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種新型組織形式，至今只有二十多年的發展歷史。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私立大學組織具有一些別的國家私立大學不具備的特性，如辦學主體多元化、公私立大學之間界線不甚清晰、營利性行為、家族式管理、注重擴大辦學規模、學校教學層次多樣、地域性特點明顯等。

大陸私立大學的特殊性是與環境的影響作用分不開的，特別是它的「微觀環境」（niche）影響著私立大學的組織特性，諸如私立大學是在空白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以致原有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統從制度和技術兩個方面對私立大學產生很強的影響。私立高等教育系統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各私立大學組織結構隨著市場化的擴大逐漸形成，並且在招生和畢業生就業管理方面，與公立大學出現區隔。私立大學成員（學生、教師和校長）的組成不同於公立大學，尤其是以兼職教師和臨時聘用為主的教師結構，形成了私立大學多元營運的特徵。

從組織學發展的角度觀之，大陸私立大學具有以下幾個特質。首先，由於近年來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私立大學所面對的環境是不穩定的，所以大陸私立大學的結構具有「通用性」的特點，表現在教學內容、管理結構、教師隊伍等方面。不過，一些學校開始逐步建立自己的管理「常規」（routine），並且將社會的規範性要求融入到組織結構中，從「不成熟」的組織逐漸轉變為「成熟型」的組織。其次，由於外在環境的不斷變化，在不同時期建立的私立大學，具有不同的組織特點，不同辦學主體舉辦的學校具有不同的特點，如企業家投資舉辦的學校與企業組織相近，獨立學院則兼有合作辦學各方的特徵。此外，私立大學也因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展現了明顯的地方特色和地區性差異。其三，私立大學群體變化符合其他從一般組織形態得出的「死亡率—時間變化曲線」，在開始階段，其產生和發育受到現有制度環境的侷限，以及人們對於這種類型學校的認可程度也較低，隨後制度因素逐漸削弱，競爭因素的影響則相對擴大。在此過程中，一些無法適應環境變化的弱小組織遭到了淘汰，辦學規模具有向少數學校集中的趨勢。

總結本文分析，中國大陸私立高等教育的重建過程實際上是私立大學系統認受性的強化與競爭機制建立的過程，先後經歷了政治認受性（八〇年代初）、行政認受性（八〇年代初到九〇年代末）、法律認受性（二〇〇二年），以致社會認受性（主要在今後）重建的過程。私立高等教育認受性的確立過程不僅僅是由一些人或團體賦予私立大學存在的權利，也是組織種群力量擴大後對於認受性地位訴求的結果。在制度逐漸建立之後，競爭成為私立大學發展的主要因素，而本論文分析亦顯示大陸各地的私立大學的發展與地方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具有密切的關係，各地的私立大學發展的形態與重心亦不同，展現了強烈的地方特質。

* * *

（收件：92年11月10日，接受：93年2月24日）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Mingban) Universitie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Organizational Features

Fengqiao Yan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80s, the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was reestablished as a resul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reforms and the opening-up policy.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Chinese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has displayed som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adopting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its special features.

Keywords: private colleges; Mainland China;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參考文獻

- Levy, Daniel C., 「私立高等教育的角色：與中國發展現實相關的國際趨勢」，2000年5月11和14日在北京大學和廈門大學的演講稿，**國際高等教育研究**（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所），第2期（2002年），頁1~8。
- 斯格特 (Richard W. Scott) 著，黃洋等譯，**組織理論**，第4版（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年）。
- 漢南等，「組織群體生態學」，竹立家、李登樣等編譯，**國外組織理論精選**（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頁190~205。
- 教育部發展規劃司，**2002年教育統計摘要**（內部資料）。
- 教育部發展規劃司、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2002年中國民辦教育綠皮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 柯佑祥，「新時期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高等教育研究**（武漢），第4期（2002年），頁32~34。
- 梁克蔭，「『陝西現象』與民辦高等教育發展」，**高等教育研究**（武漢），第4期（2002年），頁38~40。
- 劉莉莉，**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 孫琬鍾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律法規全書**（北京：中國法律年鑑社，1998年），頁980~984。
- 魯松庭主編，**浙江民辦教育探索**（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 Smith, Adam, 郭大力, 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
- 閻鳳橋，「美國私立高等教育特徵分析」，**黃河科技大學學報**（鄭州），第3期（2003年），頁143~152。
- 閻鳳橋，「民辦學校校長魅力權威及形成過程」，**教育研究雜誌**（大陸版）（臺北市），第3期（2003年），頁16~29。
- 楊全印，「關於我國二十年民辦教育政策的思考」，**江西教育科研**，第1~2期（2002年），頁55~58。
- 張莉娟，「我國民辦高校發展過程中的規章制度研究——北京美國英語語言學院案例分析」，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碩士論文（2003年）。
- 蔣萍、孫磊，「辦學規範管理嚴謹專業熱門。浙江民辦二級學院成『香餑餑』」，**文匯報**，2003年8月19日。

Carroll, Glenn R., *Ecological Models of Organizations* (Massachusetts: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Cummings, William K. "Private Education in Eastern Asia," in William Cummings and Philip G. Altbach eds., *The Challenge of Eastern Asian Education* (NY: State Uni-

- 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p. 138~140.
- DiMaggio, Paul J. and Walter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63~82.
- Geiger, Roger L., *Private Sectors in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 Function, and Change in Eight Countr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6).
- Hannan, Michael T. and John Freeman,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82 (1977), pp. 929~964.
- Hannan, Michael and John Freeman, *Organizational Ec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Lawrence, Paul and Jay Lorsch,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Managing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Pfeffer, Jeffrey, *New Directions for Organization Theor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Williamson, Oliver E., *Market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Y: Free Press, 1975).
- Zumeta, William, "State Policy and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John Smart ed., *Higher Educati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vol. 12 (1997), pp. 43~106.

